

北京天津歷險記

(本文插圖第10、37、38、39頁)

吳鑄人回憶錄(三)

●吳鑄人原著·王成聖校訂

上海南京秘密任務

張作霖查抄俄使館事件發生不久，當我把最好的朋友鄧文輝、莫同榮等安葬之後，隨即結束北京的職務，取道天津，循海路南下，先抵上海。秘密聯絡同志，往訪李石曾先生，得悉李石曾已赴南京。就在這個時候，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稚暉）、蔡元培、李石曾、陳果夫等已着手清黨——跨黨份子如不聲明脫離共產黨，一律開除國民黨籍。稍後汪精衛自海外歸國，與陳獨秀共同發表一篇「聯合宣言」，仍舊主張國共合作。由此造成國民黨無可避免的「寧漢分裂」。

那時由北京出來的同志如張道政、石原泉、蘇德煌、李蔚堂、高宗禹還有我，在立場上是傾向與共產黨劃清界線的。當年在上海的同志中，有不少是傾向武漢方面的。他們竭力慫恿我們到武漢去。回想最初我是由丁惟汾先生介紹入黨的，同時丁惟汾又是我的老師，因此決心奔赴南京。見到了惟汾之後，他把南昌共產黨如何欺騙我們的經過告訴了我；並說顧孟餘先生本來受中央組織部長蔣中正先生之託，到武漢去設法說服汪精

衛等與留在南昌各中央委員一同去南京，使黨內同志團結起來，一面徹底清黨，一面完成北伐，沒想到顧孟餘反而留在武漢不肯回來。這使丁惟汾對顧孟餘很不諒解。

丁惟汾除了為我分析時局，也要我報告查抄俄使館的詳細經過。在二十位遇難者中，有一位丁惟汾最賞識的忠貞同志路友于，所以當我講到路友于是第二位被絞死的烈士時，丁惟汾熱淚盈眶，歎息不已。

接着我又去拜見李石曾先生。李石曾那時住在後湖百花洲那邊。李先生問我：「你來得好極了，目前住在那裏？」我說：「我現在住在上海。」他說：「你住上海最好，過兩天我也要去上海。那邊有成舍我等同志正在計劃去北京天津工作，你可以去參加研究。」於是我又回到上海參加李石曾先生所召開的會議。不久我又由上海搬到南京，住在鼓樓左近一家小旅館內，名字我還記得叫「興泉客棧」。一個小房間共住了李蔚堂、高宗禹和我三個人！

由於我是安徽人，在南京這段時候，我就聯合京滬一帶的皖籍同志組織了一個「安徽評論社

」。該社的目的在秘密活動號召聯絡皖籍國民黨同志一致反抗軍閥，努力完成北伐大業。參加的主要成員有李蔚堂、高宗禹、邵華、劉真茹、余良猷、冷鶴、謝仁劍、余凌雲和我。

就在這時候，也不知是誰提名我為國民黨直隸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後來我想大概是丁惟汾向陳果夫推荐的吧。當時在黨中央方面，蔣中正任組織部長，陳果夫任副部長，吳倚滄任主任秘書。我於接到任命狀後先去拜謁了惟汾，請他指示工作方針。丁惟汾見到我很高興，問我那天北上。我說：「有關直隸省的黨務我不大清楚，特來請您指示。同時前省黨部委員韓麟徐等都是共產黨員，當然不會來辦移交，所以一切都必須從頭做起。」丁惟汾說：「是的，你可去組織部看看陳果夫和吳倚滄兩位先生。」此外丁惟汾又為我開了一張名單，並一一指出其中那些人負責可靠，那些人比較辦事馬虎。丁惟汾忠黨愛國和愛護青年的熱誠，實在令人敬佩。

在南京成賢街國民黨組織部看到陳果夫——那時中央黨部還沒搬到丁家橋。陳果夫出來接見我。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並不好。我久仰陳果夫

的大名，我想他一定很英武，很有氣魄，沒想到他出來時穿着一件夏布大褂，顯得那麼瘦，那麼弱。但是，他的一席有關解決勞資糾紛的話，使我改變了對他的印象。他說：「說到勞資糾紛的問題，工人不肯增加工作時數，只要求增加工資，等到資方虧本，工廠必然倒閉，工人也就失業了。」這是一針見血之論。他又說：「共產黨表面看，是在幫助工人，其實依他們的辦法，工人的生活並不能獲得改善。要為工人謀福利，一面要增加他們的工資，一面要減少他們的消費。今天我國勞工好像是一個患了肺病的人，醫治之道，一面要增加他的營養，一面要減少他體力的消耗，雙管齊下才能收到效果。怎麼樣減少工人的消費呢？要成立消費合作社，使工人日常生活必需品不受中間商的剝削。」這套理論對當時的我來說的確很新鮮。因我是學科學的，對這類問題很少接觸，從未作過深思。那次晤談很愉快，使我增長了見聞，也對陳果夫有了較深的認識。

回到北京推展工作

奉派回北京從事秘密推展黨務工作，可以預期待工作之艱鉅，所以起初未嘗不想推辭，但又不好意思開口。繼而一想，要革軍閥的命豈能貪生怕死？於是毅然北上就職。不但自己北上，而且還把中央黨部給其他同志的派令一起藏在身上帶了上去。坐船到了天津，先將派令一一面交各委員。

奉令在直隸省黨部工作的一共有九位，除我之外，有王宣、張清源、王南復、卜哲明、呂雲

章、焦實齋、于紀夢。目前我只記得八個人的姓名，其中呂雲章是位女同志。第一次成立大會由童冠賢在北京平民中學召開，並分派工作。會中決定，由王宣任常務委員，張清源任組織部長，于紀夢任宣傳部長，我除擔任臨時執行委員外，又派我兼青年部長。後來因為宣傳部長于紀夢未到職，所以又派我兼代宣傳部長。

在北上之先，我曾前往杭州拜望我的恩師譚熙鴻（仲遠）先生，請他指教。譚熙鴻江蘇蘇州人，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老同志，與汪精衛是連襟。當時他是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農學院設在笕橋。見到譚熙鴻我請教說：「這次我到北方去做秘密工作，非常危險，總得找個掩護，不知先生在北京天津一帶有些知交故舊，在我最危難的時候，能够及時援手？」譚熙鴻先生真是了不起，他給了我兩個學生難忘的大幫助。

譚熙鴻給我的第一個幫助是他把張伯苓介紹了給我。譚熙鴻對我說：「我給你介紹張伯苓先生，不過張先生不搞政治，只辦南開，所以平常不要去麻煩他，到緊急關頭再去求助，一定會得到照應。他是我好朋友，到天津可先去看他。」於是就寫了一張簡單扼要的片子給我，我一到天津就立刻去拜見張伯苓先生，並取得他的首肯。

譚熙鴻給我的第二個幫助更為及時而重要。原來我在北大讀書時，譚熙鴻是北京大同中學校長，胡寶圖先生為該校校務主任，我在大同中學任教員兼訓育主任。就這一層淵源，譚熙鴻說：「胡寶圖和我都不在北京，大同中學今後就由你來代理校長。」他於是又寫了一張片子給我，授權

我代理校長。這是我接管大同中學的開始。由於譚熙鴻先生的協助，在機關組織方面，我有一個學校作為掩護，在人事關係方面，緊急時可向張伯苓先生求助。譚熙鴻先生對我當時的革命事業，幫助實在太大了，至今對他老人家仍感念不已。

到任後所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合適的秘書。我是安徽人，北京是個五方雜處之地，而直隸省的情況也不單純，所以一定要找一個直隸人來幫忙，才能收地利人之便。當時我們「實踐社」有一個關係很深的外圍組織，叫「順直革新會」，會中有一位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同學賀翊新（仲弼）。賀君沉默內向，文筆好，做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苟，是個做秘書的最佳人才。因此我就請他担任青年部的秘書，他也一口答應。賀翊新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他出身直隸省故城縣的書香世家，因此對於南開北洋等大學，以及省立學校，都有其親戚朋友轉轉介紹青年加入革命行列，使黨務組織發展得很快。像唐際清（南開學生後來作過中央日報的總編輯），賀其助等全是當時吸收的好同志。

出錢出力犧牲奮鬥

在這段期間，我經常來往於北京和天津，主要為了積極推展黨務工作，其次是為了照料大同中學。大同中學對於我當時的革命事業貢獻極大。它除了在身分行動上可以給我莫大的掩護外，同時在這個等於是國民黨辦的學校內，教職員和學生都是實際參與黨務工作的得力助手；吸收進

來的學生可以叫他們爲黨做些秘密傳遞消息的工作，教職員都是自己同志，更可以請他們担起有危險性的任務。

那時青年部，除部長外，只有一位秘書，組織非常簡單。中央每月只給省黨部三千塊銀元的經費，多一半用在業務方面。每位委員每月只有二十塊錢的生活費。每月二十塊錢對我而言，連往來北京天津之間的交通膳宿都不夠，遑論生活及工作之所必需了。所以我只好東挪西湊，想盡辦法來應付當時的困難。有一次不得已寫了封信回家要錢，父親覆了我一信，大意是：「你最近回家信也不常通，不知你在外面搞些什麼名堂？以前來信還報告自己的生活和讀書狀況，現在竟一字不提，而用錢却大幅增加，我想你可能是墮落了。如果是墮落了，我看你還是趕緊回來種田，不必再讀書了。」他老人家信中有這樣的句子：「等而下之，歸農可也。」就好像我在北京已經墮落了似的。實際上我有難言之隱，爲了黨務工作的機密性，也爲了不使他老人家担驚受怕，我不能在信上明言自己現在正在從事革命工作，所以急需錢用。由此可知，我們那時爲了黨國，爲了革命，是自己出錢、出力、賣命來幹的。北伐能成功，軍閥能打倒，就是憑着這種犧牲奮鬥的精神。

面對偵探策反脫險

民國十六年多，張作霖下令通緝我。張手下知道我有三個去處：第一是北京私立大同中學，因爲我是該校代理校長，必須到校辦公。第二是

大同中學教務主任郁士元先生家。第三是大同中學事務主任胡成之先生家，也就是胡適之先生家，因爲他們是堂兄弟住在一起。這件事大概發生在嚴寒的十一月某天（確實的日子我記不清了）上午十一點左右。偵緝隊派便衣偵探同時把三個地方都監視了起來，等我一出現就捉人。另外派武裝警察及憲兵持大元帥府公文進入胡府搜查，並在裏面等我來自投羅網。事發的前兩天，我正住在胡成之家。同時胡府還住了一位南開大學及國立女子大學地質學教授曹誠克（勝之）先生，也是安徽績溪人。事發當天早上，曹誠克託我代他向我的老師生物系主任經利彬先生借一本普通生物學。

我大約在上午十一點到達經公館，借到曹誠克所要的書後，經師母留我在他家吃午飯，我辭謝了，立刻坐洋車回胡公館復命。胡公館原在隲山門大街六號，後來遷到同街十四號。因爲胡適之先生和夫人多半都住在上海極斯非爾路七十六號，北京不需要大房子。

車到隲山門大街，我忽然感到情況有異：胡宅附近似乎有許多便衣偵探在徘徊。但由於當時胡宅鄰居有人結婚，爆竹喧天，賀客盈門，我又懷疑那些人可能是來看熱鬧的，也就不太在意了。不過當我付完車錢，正走過去打算按門鈴時，發現胡家女傭王媽站在門口，神色大異往常，這才警覺到事態嚴重！因爲北京的傭人平時見了客人，都有一套客氣話的，例如王媽平常見到我一定會說：「吳先生，您來了，您好吧？您吃過飯了嗎？」或者說：「吳先生，您來啦！六老爺在

家，您請進，再約兩個搭子陪您打麻將好啦！」可是那天我見王媽呆若木雞，兩眼發直，平常的客套話一句沒有。我知道情況不妙。但表面不得不故作鎮定，於是從容不迫的走過去對王媽說：「曹先生要我借的書已借來了，他回來請你交給他。現在我還有別的事要辦，就不進去了。」說完，即刻溜開。

亂轉一通擺脫跟踪

離開胡府之後，發現有兩個便衣在後面跟踪。於是走到隲山門大街六號，北大英文系主任陳源（通伯）先生門前，裝着去拜訪他的樣子。一叫門，是他家傭人老邢（國春）開的門。我問：「陳教授在家嗎？」他說：「不在，到南邊去了。」我問：「林小姐呢？」陳源的夫人叫林淑華。他說：「到日本學畫去了。」「那麼老太太呢？」「老太太出去打牌了。」我說：「好吧，等老太太回來就說我來拜望。」後面兩個偵探看我好像真是來拜訪朋友的客人，對我盯得就不那麼緊了。不過仍跟在我後面。爲了儘快擺脫他們，我趕緊拐彎走到「大石作」，那裏有一處停洋車的地方，我跳上一個年輕力壯車夫的車：「快，西單牌樓。」我爲什麼挑個年輕力壯的車夫呢？第一，他跑得快；第二，他比較不會是偵緝隊的眼線——當時傳說偵緝隊會雇年長一點的車夫作線民。

在車上我一直擔心後面仍有偵探跟踪，所以一到西單牌樓就下來了。走進街邊市場買了一個大蘿蔔，叫賣蘿蔔的把皮削了。邊走邊啃，亂轉

一通。這樣一來，我確信即使有人跟蹤，也一定被擺脫了。然後我安心的步行到教育部街（後來改稱市黨部街）的「首善公寓」。爲什麼來到首善公寓呢？因爲我的兩個女學生張文英、吳清華以及我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後來成爲我太太的劉仲鶴都住在那裏。我投奔她們的寓所以求掩護。

到達首善公寓大約是下午兩點鐘左右。劉仲鶴她們剛剛午睡起來。我告訴她們說今天胡公館好像出了紕漏，並請仲鶴趕快替我打個電話去胡府問一問。不過我請她不要用首善公寓的電話，而是到學校去用學校的電話打。仲鶴打過電話回來說電話接通後，胡成之一味的叫：「喂，你是誰呀？誰呀？」問他話他一句不答。仲鶴說：「胡成之今天要不是有神經病，就一定是他家裏有什麼人把他給困住，使他不方便答話。」

到了晚上九點鐘，胡成之來到首善公寓，劈頭第一句話就是：「老吳，你真狗運亨通，今天算是刀下留人！大元帥府的通緝令是：『吳壽金，卽吳錦人，限三日內拿辦歸案』。今天你要是給逮去了，還有小命嗎？我曉得你今天來過，王媽偷偷告訴我你來過一晷又匆匆走了。你若一進去就會立刻被帶走，武裝憲警就埋伏在裏面，外邊也有便衣，只要你一叫門便手到擒來。」我說：「我真不知道是這個樣子。平常我並不機警，可是今天一看王媽神色慌張，平常那些客套話一句沒有，就立刻覺得其中必有緣故，因此沒敢按門鈴。」他笑着說：「幸虧你沒按，否則現在已是階下囚了。」

當晚不敢出門，就在首善公寓開了一個房間稍作喘息。不料驚魂甫定，夜晚十一點警察提着兩個大燈籠來查房間，遠看就像猛獸睜着兩個大眼睛撲向我這驚弓之鳥！我一看，苗頭不對，急中生智，立刻裝病，用手指搥嗓子，嘔吐呻吟不止。查房間的人一看，地上吐得一塌糊塗，皺着眉頭就走開了。這一夜我不曾合眼。第二天清晨五點，趁天還沒亮，就坐洋車到前門車站，跳上頭班火車前往天津暫避風頭去了。

回憶這一天我兩度進出鬼門關，能够戲劇化的死裏逃生，真是意想不到的奇蹟。我只有歸諸神靈的保佑了。我的命不該絕，還得感謝救命恩人——王媽，因她的驚恐表情，使我得以遠避魔掌。

逃到天津再次歷險

到了天津之後，就住進國民黨青年部秘密辦公的地方——法租界三十二號路。誰知一險方過，一險又來！由於前一天晝夜迭歷險境，精神過於緊張，徹夜不曾合眼。所以到了天津就想好好安睡一陣。沒想到當天一早就有兩個偵緝隊前來叫門。

當時直隸督軍兼省長是褚玉璞。褚捕殺國民黨人不遺餘力。天津青年部有位書記，姓劉，河北保定人。爲人忠實可靠，但却不够沉着機警。當時天津一般住戶大門上都裝有「小窗」，窗口有個蓋板，有人叫門，先打開蓋板，看個清楚，問個仔細才開門。「小窗」的功能，有如今日公寓大廈的「電眼」。我曾對劉書記說過，如果有

人叫門，不必開小窗詢問，就把大門敞開，不論是誰，大大方方的請他進來。誰知偵緝隊來叫門時，劉書記仍舊先開小窗，一看之下，就察覺到兩人來意不善，說什麼也不肯開門！這使兩個便衣感到懷疑，於是繞到屋後，從廚房窗口跳進屋內。當時我已睡醒在樓下洗臉。猛見兩個陌生人從窗口跳進來，使我又驚又怒，乃大聲吼道：「你們是什麼人？」其中一人掏出了「派司」，說：「我們是偵緝隊。」我說：「來幹嘛？」他說：「你們這裏是個亂黨機關，我們是來查亂黨的。」我理直氣壯的大聲說：「豈有此理！這地方那裏是什麼亂黨機關啊！這是交通部馬司長的住家，他因爲傳作義已經打到涿州了，所以租下這棟房子，叫我給他看房子。」

這棟房子，樓下是劉書記的辦公室。桌上放了許多有關黨義的書，如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等。樓上是我的房間。因爲當時直隸省黨部宣傳部長于紀夢沒到職，由我兼代，所以我房間內堆滿了各式宣傳品。

偵緝隊指着劉書記桌上的書籍詰問，我淡然答道：「這些書每家書店全有得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兩個便衣交頭接耳了一下，由一個身材較矮小的留在樓下監視我們，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就逕行上樓檢查。我一看情勢不對，急忙喊道：「樓上是小姐臥房，小姐還沒起床，你怎麼可以擅闖閨房？」他那裏肯聽，直奔而上。這時劉書記也急忙跟了上去。不一會，就聽樓上那個便衣大叫：「把底下那人給綁上！」因爲樓上的真憑實據被他抓到了！我的態度因此而立刻作了

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於是和顏悅色的對他們說：「慢來，慢來。咱們有話好好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等我洗好臉，我會上樓，和你們二位好好的談談。」在這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當時我想只有三條路可走。上策是策反：就是用革命的大道理說服他們，使他們加入革命陣營。中策是和他們決鬥：他們有兩個人，我們也是兩個人，兩個對兩個，總還有一半的勝算。我當時已想妥了，萬一動手，可先乘其不備，拿起桌上的大砲台，使足力氣對準那個大個子的腦袋砸下去，劉書記見我和大個子打起來，他必定會攻擊另外一個。但這樣做一定要出手極快，不能讓他們有掏槍的機會，否則就糟了。下策是束手就縛，乖乖的跟他們走。

三條道路在腦海中閃過之後，我決定先探行上策。萬一上策走不通，再執行中策也不遲。

危急存亡鎮定應付

危急關頭既然豁出命去了，人反而鎮定了下來。首先我對劉書記說：「請你去給他們二位泡杯茶來。」接着掏出一平常抽的「美麗」(MY DEAR)牌香煙敬客。

他們似乎已看出我的緩兵之計，便說：「不要拖了，快跟我們走吧。」我仍婉轉的說：「不用急，能和兩位碰面，真是難得的機會。平常我總是避着你們，你們也找不到我，今天既被你們找着了，大家不妨先坐下來聊聊。跟你們走很簡單，我一無武器，二又沒力氣，逃不了的。」大家坐下以後，一面請他們抽煙喝茶，一面將我的

身分坦白的告訴他們：「我是什麼人？今天對你們講明白了罷。我是中國國民黨直隸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青年部部长，並兼代宣傳部部长。剛才對你們說我是給交通部馬司長看房子的，那是鬼話。今天主動把自己身分向你們明說的，這表示要誠心誠意的和二位交個朋友。」看他們有軟化的跡像，於是我接着慷慨激昂的繼續說：「我來是幹什麼的？我是來革命的。革什麼人的命？革張作霖、褚玉璞這些軍閥的命。我現在請問你們，今天你們在軍閥手下做事，爲的是什麼？不過是爲了十多塊錢一個月的薪水。這麼大冷天，你們身上穿的衣服這麼單薄，還辛辛苦苦的出來抓人，實在太可憐了！你們看張作霖、褚玉璞他們，妻妾滿堂，奴僕成羣，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貂皮、虎皮，連羊皮都不屑一顧。他們驕奢淫逸到了極點。這就叫作不平等。孫中山先生說得好：『吾人革命之目的，使不平等者底於平等而已矣。』」

換句話說，革命就是打抱不平。你們的生活和張、褚等軍閥生活相比，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太不平等了。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你們的生活水準提高，把他們的生活水準降低，使得二者之間接近於「平」罷了。

「今天我在這裏做的工作，就是爲你們打抱不平的工作。請你們看看我過的是什麼生活？是享受呢？還是刻苦呢？睡的是木板床。墊的，冬天是一層破褥子，夏天是一張草蓆。我的財產只不過是一個箱子和一個網籃。箱子裝的是舊衣服，網籃放的是日用雜物。可見我的生活談不上半點享受。而這正是一般革命黨人普通的生活狀況。我們不辭勞苦，不避艱險，不怕犧牲，爲的是什麼？一切都是爲了革命。」

「現在你們將我抓去，或者會因此而加薪、領賞、升官，但你們可曾想到這件事情的後果的嚴重性？今天我們的革命軍，平漢路上傳作義已經打到涿州，津浦路上也已攻佔了徐州，正在快速向北推進。一旦大軍攻破北京和天津，將來必然會追究起我的下落，究竟是被什麼人捉去交給軍閥殺掉的。調查結果原來是你們兩個人幹的，那你們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到那時，張作霖、褚玉璞必定早把你們丟下，自己逃命去了。」

「反過來說，如果你們能棄暗投明，和我們一同搞革命，我們國民黨佔領北京、天津之後，我爲了報答二位今天的救命之恩，以直隸京津之大，還怕沒法爲你們找到更好的工作嗎？你們參加我們的革命行列是救國救民的，是大有前途的。二位，請別猶豫，跟我合作，做我們的好同志吧！」

兩個人中，個子小的一位很好。他被我的番話感動了，首先開口：「在我們所抓到的革命黨人中，以吳先生表現最痛快，說話最清楚。他們革命是爲了打抱不平，講得明明白白。」大個兒看小個兒已經動搖，急忙說：「他們這些搞革命的，都是耍嘴皮子的，說話不算數。」我立刻大聲說：「爲什麼不算數？要怎麼樣才算數？」大個子說：「把你手上的戒指給我們做個信物，如何？」我說：「戒指不能給你們，這是我定婚的紀念品。」他於是說：「那麼你開張支票給我

們。「我說：「我那有支票可開？我既是革命黨人，那能在此地銀行開戶頭？同時你們看我這個樣子像是有錢開銀行戶頭的嗎？」後來他說：「你的箱子我們要帶走。只要你講的話都兌現，我們會把東西統統還給你。」我暗自一驚，因為箱中有五、六百公款，但口中說：「沒問題，但天冷，我得留幾件衣服。」於是我把箱子打開，一面翻動衣服，一面像變魔術似的把公款暗暗放進了一件棉襖口袋，然後把棉襖穿上，外加一件皮袍子。等一切就緒，我說：「好了，箱子你們拿去。今後我們是同志了。大家同甘共苦，你們有什麼困難，儘管來找我，我一定負責解決。」大個子還是不放心，說：「你最好還是把戒指留下來。」我因為已經把公款全都藏到口袋裏，又怕把氣氛搞僵，只好同意，并且很誠懇的說：「我還要為你們籌一點工作費用。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我去想辦法，星期一上午十點你們請來此地。多少錢現在我不敢說，我一定盡力而為，籌多少是多少，如何？」他們說：「好，你放心，到時候你的東西我們都會還給你的。」如此，一場驚險總算化解開了。

策反成功化敵為友

事後我想，和這些人打交道，等於在玩命，但如善加運用這層關係，對推展革命未始不是一大助力。權衡利害得失之後，決心冒險和他們繼續來往。當下最傷腦筋的問題是到底給他們多少錢才合適。給多了，會令他們懷疑我們是有錢機關，以後經常來敲竹槓。給少了，不足以鼓勵他

們棄暗投明。思之再三，決定給他們每人五十元。這在當時也算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了。最後我還替自己留了一手：一百塊錢全部用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的五元及十元券，並暗中把鈔票的號碼都記了下來，為的是防備他們萬一跟我翻臉，我也有個憑據。

當天他們一走，我們立刻把所有的文件、書籍、宣傳品運走。他們星期天晚上跑來打探我籌款情形，發覺我們把東西全搬光了，不免懷疑我的誠意。可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十點鐘，他們準時而來，見我說話算話，便豎起大拇指說：「英雄！我們都聽你指揮，你說什麼我們就幹什麼！」我說：「請不要恭維我。從今以後大家一起為革命效力，等把軍閥打倒了，大家才會有好日子過。」接着我掏出那一百塊錢說：「我籌到一百塊錢，是我向朋友們借的，當作見面禮，意思！意思！」他們一再推辭說不好意思，我說：「你們不拿就表示看不起我，以後怎麼請你們接受我的指揮呢？」他們見如此說，就把錢收下了，並立刻把戒指還給了我，到了晚上，把我的箱子也送來了。

這次策反成功，化敵為友，不但使自己轉危為安，而且為往後的革命工作平添了兩大助手，挽救了不少同志的性命。

革命情緒日益高昂

過了幾天，這兩個偵緝隊便衣偵探忽然跑來對我說：「今天我們又查到了一個機關，那地方比你這裏大多了。」我一聽立刻叫他們帶我去看

。到了之後，我發現了一隻張清源同志的手杖，於是對兩個便衣說：「這是我們同志的機關，這隻手杖的主人是組織部長，你們千萬掩護一下。」當時張清源和他的秘書王述先，以及省黨部幹事崔樞貞女士等住在那裏。王崔兩位患難同志後來且結為恩愛夫妻。他們的機關經費足，所以場面要比青年部壯觀多了。兩個便衣自然想從這裏多弄一點油水。但聽了我的話，也只好作罷。當然事後我總免不了要破費酬謝一番。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兩件很令人感慨、有意義的往事：

(一)因為當時直隸省黨部的經費，全部掌握在該省省籍同志的手中，所以我的處境是很窮困的。九個執行委員中八位是「興中社」的，只有我一人是「中山主義實踐社」的，所以有時難免被忽視。從南京攜派令回到天津時，董冠賢先生曾對我說，要在青年會給我找個房子作掩護，一定要好好把我安頓下來。實際上是安排我睡在天津日租界旭街一位省黨部王同志家中門房的炕上，如同僕役一般，生活異常清苦。雖然如此，我還是一盡力安之若素。記得有一次李超英先生到北方來視察，看到我住的地方，非常不滿，說：「這太不像話了！怎麼能讓你住門房呢！」我反而安慰他說：「超英兄，我們是為革命而來，並不是為享受。如果連這點苦都不能吃，這點氣都不能受，還談什麼革命理想，時代使命？更別提共同努力打倒軍閥了。」自從策反成功，掩護了組織部機關，張清源及王宣等同志大受感動，並邀我和他們一同住在英租界張令聞家，從此我的生活

護得了改善。有時也在外面花十個大子兒吃碗燴餅，挺爽口的；口袋裏錢多一點時，偶爾也會上澡堂子裏去泡泡，舒散舒散。

(二)北方冬天很冷，我住在日租界時，一切因陋就簡，加以工作繁忙，手頭拮据，奔波勞累，常常衣不解帶，和衣而眠。由於經常很久不換衣服，身上到處是蝨子，且在棉衣裏作了窩。久而久之倒也習以為常了。真所謂「蝨多不癢，債多不愁」了。搬去和張清源他們同住，生活驟然考究了起來，開始注意衛生了，漸漸也感覺身上蝨子作怪。有一天和清源一同上澡堂，他見我身上有蝨子在爬大驚。由於是在公共場所，怕人家笑話，只悄悄問我是怎麼搞的。回去後趕緊向張令開家借了一個打蚊蠅的唧筒，把我的內外衣噴了一個徹底。經過拍抖，落地死亡的蝨子竟然裝滿一大酒盅。見到的人都很吃驚，我却不以爲恥。

在搬來與張清源他們同住的時候，北伐軍已攻入直隸省境。勝利在望，因而我們地下工作者的處境也越發凶險，工作更爲緊張，而同志們的士氣也隨着北伐軍的腳步，日益高昂。

那時，除了我份內工作以外，還參加許多其他部門的工作。記得那時每天晚上各部門有關同志都有一次聚會，檢討當天的工作得失，安排次日的工作計劃。在這每日一次的聚會中，我受到

同志們的器重，個人也感到了極大的參與和成就感。其實那時我只有二十六歲。嚴格的說，還只是一個大孩子。但由於天天搞革命，爲情勢所迫，許多稀奇古怪的主意，不知是怎麼想出來的！許多棘手問題，也就因此而解決了。這或許就是孟子所謂的：「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吧。關於策反成功這件事，張清源曾當面讚我說：「鑄人啊，你真是有胆有識的革命黨人，令人敬佩。」後來在他的自敘年譜中，還特別提到這件事，且強調由於吳鑄人同志的策反之功，保障了當時天津地下機關的安全，增加了暗中活動的方便。(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歧 將軍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爲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酋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鳥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慰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歸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編，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字，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一四四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立即寄書。